

主 编◎王斯德 童世骏

现代化进程中 的 中国人文学科

— 史学卷 —

本卷主编 盛邦和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现代化进程中的 中国人文学科

史学卷



著 者：（以章次为序）

盛邦和 路新生

胡逢祥 王 东

邬国义 朱政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王斯德等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4968-8

I. 现… II. 王… III. 史学史-研究-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827 号

责任编辑 唐燕能
封面装帧 傅惟本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

主编 王斯德 童世骏

本卷主编 盛邦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5 字数 395,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4968-8/K·1036

定价 30.00 元

序 言

在西方,尽管“现代化”作为一个学术词汇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流行,但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就已经用这个词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了。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讨论的发起者主要是历史学、哲学甚至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但无论是19世纪末的“富强”、20世纪初的“德赛”(科学和民主),还是20世纪后期的“四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和世纪之交的“全球化”,用来表达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和现代化纲领的语汇来源,却似乎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大致说来,中国的现代化讨论的自觉程度高而专业含量低,人文学科对现代化讨论的介入时间早但系统梳理少。本书(三卷)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后一个问题,并希望藉此而有助于(与社会科学一起)解决前一个问题。

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表明,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不仅要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宏观角度来加以认识,而且要对这三方面本身都作广义的理解。经济现代化不仅涉及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涉及个体的经济行为,尤其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组织形式运作方式。政治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现代公共行政系统的建立和完善,而且意味着具有现代特征、因而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政治理念的政治文化的出现,以及公共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具有合法基础和程序。文化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全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公民教育状况的改善,而且表现为各个专业性文化领域的发展,各学科领域的创新和积累,以及公民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

文化内容的变化。实际上,在“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我国现代化目标的正式表述中,“文明”一词具有极为丰富的含义。为理解这些含义,文学、史学和哲学领域的学者有义务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人文学科涵盖的学科甚为丰富,本书主要涉及文学、史学和哲学。

大致说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文、史、哲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学科作为专业而分化开来;从事这些学科的人们一方面作为专业人员从日常生活领域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作为某个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同其他专业人员分离开来;在教育、研究和出版等方面出现与这些人文学科相应的专业性社会建制;文学表现形式、史学研究方法和哲学思辨工具等方面的自主性和自觉性的提高等,所有这些,作为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都是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是整个现代社会图景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这些部分作详细描述和诠释,是本书写作的初始理由。

其次,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作为传递和创造意义、维持和更新认同、提炼和表达理想的文化领域,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自我认识。文学在表现形式上实现“文的自觉”的同时也追求文学内容上的“人的自觉”。历史学在形成一门科学的同时,致力于把握中国社会过去的脉络、当前的性质和未来的走向。哲学在经受现代科学和逻辑洗礼的同时,致力于对时代精神的概念框架的批判和建构。在外部压力之下启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比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觉性和反思性,因而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更有必要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自我认识的研究包括在内。“社会意识”固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和“存在”关系不同的是,“社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存在与一般存在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们的这种思想、感情以及人们对自己的活动和关系的理解和评价,在文学、史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当中以不同方式得到集中体现。这些学

科的发展不仅作为文化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属于整个现代化过程,而且作为现代化过程的自我认识而成为现代化过程这种反思性历史实践的特别重要的部分。这种自我认识不仅在过去体现和引导了人们评价和调整客观的现代化过程的努力,而且在现在有助于我们认识目前所处的现代化阶段,有助于提高现代化历史实践的自觉性。对现代化进程的自我认识作系统梳理,这是本书写作的核心理由。

最后,文、史、哲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不是单个地发生着、孤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密切交织互动的。不论从其历史起源还是从其现代形态来说,文学、史学和哲学之间都具有密切联系。不仅是这些学科所共有的难以分割的传统资源,也不仅是近代学术大师们出入于诸多不同领域的卓越才能,更主要是这些学科的内容本身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文、史、哲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作一个整体的研究。就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关系来说,可以说离开哲学的史学和文学是盲目的,离开史学和文学的哲学是空洞的。就史学和文学来说,一个是专注于记载事实、反思过去,另一个着重于表达情感、想象未来,两者缺一不可,而且相互补充:记载与表达、事实与情感、反思与想象、过去与未来,这些方面每一个都是一个完整的“时代精神”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每一个都需要从它的对立面中得到平衡和滋养。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相互切磋、彼此沟通、通力合作,努力用集体智慧共同勾勒中国现代化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丰富关系,这是本书写作的第三个理由。

如若本书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史、哲学科的互动关系及文、史、哲诸学科自身现代化的发展轨迹作出有意义的梳理和诠释,有助于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反思,那将是本书作者的莫大欣慰。

目 录

导 言	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行程与流派	1
第一节	史学的现代化	1
第二节	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行程	3
第三节	中国现代史学的三大流派	18
第一章	经学在中国近代的蜕变	29
第一节	经消史长	31
第二节	“古”“今”之变	47
第三节	今文经学派内部学理的变化	55
第四节	对近代资治学风的一点思考	78
第二章	通向世界的文化桥梁	85
第一节	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	85
第二节	寻求救国真理——史家视野中的西政和西学 ...	108
第三节	东西文化交融中的现代中国史学	124
第三章	历史哲学的现代性变迁	150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历史变易观	151
第二节	由历史变易观向历史进化观的转换	161
第三节	“史界革命”与西方历史哲学的引进	177
第四节	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新史学建设中的两种 哲学视野	188

第四章	经世学的现代诠释	219
第一节	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	219
第二节	新史学思潮与经世致用	233
第三节	求真与非功利主义	24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功用观及反思	274
第五章	文化批判主义与批判史学	299
第一节	思潮与史潮	299
第二节	西学渊源	307
第三节	史观与业绩	318
第六章	民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335
第一节	反思旧史与民族史论的创设	336
第二节	丰硕的学术成果	355
第三节	民族史学与西方思想	381
第七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	393
第一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程和成就	393
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	410
第三节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427
结语		442
参考文献		446
后记		451

导 言

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行程与流派

第一节 史学的现代化

一、什么是传统史学

就中国而言,传统史学就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封建史学,它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鉴的、无人民参与的、经世治用的、以政治为重心的儒家史学。一部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儒家史学。儒家史学是前现代时期基于农业社会而产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史学、循环史学、封闭史学、僵滞史学。在中国新史学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推其大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① 梁启超所陈甚是,切中了中国传统史学之要害。中国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一如西方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奴婢,中国史学大部分实是儒学的“奴婢”。一方面六经皆史,另一方面诸史皆“经”,中国

^① 《新史学》,《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的大部分史学都是儒“经”的注解,正史的注解。

二、什么是现代史学

现代史学是立足于工业社会的土壤上长成的“参天大树”,故其与民主、科学结缘。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史学是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科学的、民主的史学,是本着科学和民主境界追求的、对实证主义批判性继承与发展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结合的、自我民族文化认同的、体例上的追求与史学思想方法一致的新史学。它是向前发展的,是开放和与时俱进的,是先进文化的根本体现,是历史学科思想的反映和体认。中国史学的现代性建设,是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史学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阵地,是引领中华民族融入国际社会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学科阵地。总括而言,它必须也必然是民族史学、民主史学与科学史学。

三、什么是史学的现代化

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无疑是指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史学迈入现代史学,就是由资鉴史学变为社会史学,由致用史学变为科学史学,由朝廷史学变为民主史学,由英雄史学变为民众史学,由观察表象的史学变为探寻本真的史学,由记载陈迹的史学变为发现规律的史学。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不仅是史学主体的现代化,即史家的现代化,也是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历史描述、史书体例、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史学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系统的、深刻的、不可逆转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它渗透到史学的方方面面。全球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起步而起步,同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携手并进的。当然,由于中国现代化创发的特殊性,即不是直接从内部自嬗,而是“欧风美雨”从外部压迫刺激,从而引发其内部的代谢,因而中国史

学的现代化萌发不得不早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启动,中国史学是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出于“制夷”、“御侮”的需要而“开眼看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客观地说,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应是20世纪初的事情。在此之前,主要体现为史学研究的视野、内容、重心和体例的不断现代化,即研究视野的世界化、研究内容的多样化、研究重心的反侵略救亡化、史书体例的非正史化。这些大都是史学表层的现代化。在此之后,则集中表现为历史哲学、历史思想、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其中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成了两大主要的历史哲学取向,同时又是两大主要的研究方法。这些已深入到史学现代化的里层,其中,历史哲学的现代化,是史学现代化的核心。本书把中国史学现代化的逻辑进程向上推衍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庆、道光之际,是考虑到史学内部的自身嬗蜕。经学的衰变、史学的成长,即“经退史长”正从此开始。故而,19~20世纪中国史学的现代化的进路依次为:19世纪前半叶是史学现代化的萌发,表现为经学的边缘化,史学的自主化。19世纪后半叶为史学现代化的初始,表现为史学外层的现代化,如史学视野的现代化、史书体例的现代化。20世纪上半叶,进入史学内层的现代化,即历史哲学与历史思想的现代化,至此,史学现代化全面启动。20世纪下半叶,史学内核进一步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引领史学现代化进入高潮。由此,我们有了本书的前四章,即中国历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行程。

第二节 中国史学现代化的 的四段行程

本书共分七章,前四章重点阐释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行程,后三章专门介绍推动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的三大流派。四段行程、三大流派编织本书的逻辑构架。首先论及四段行程。

一、经学的蜕变

中国传统史学是儒家史学,儒家思想在政治理念和价值体系方面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是传统史学的指导思想。经史不分,经史互为表里,六经皆史,诸史皆“经”;经学史学化,史学经学化。这些理念和行为,使得史学沦为经学统治下的奴婢,一部二十四史绝大部分是儒家史学,而绝大部分其他史书又不过为二十四部正史作注脚而已。经而史,史而经,经史不分,经学霸占学术话语与学术中心的局面从19世纪以来开始发生嬗变,到了19世纪40年代以后,形势则急剧变化,经学地位江河日下,一发不可收拾,史学挣脱经学的羁绊,日益自主化,经学逐步肢离解体,最后归并于新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文、史、哲中去,从而消弥于无形之中。由是,我们有了第一章《经学在中国近代的蜕变》。

本章前三节阐述了经学蜕变的三个层次,第四节是围绕经学有关的资治学风的反思。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学术代表无疑是经学。经学的蜕变,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它是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某种变化的折射。过去,我们对经学变迁的诠释即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来进行的。但是,经学本身并不仅仅是社会存在的附属物。以学术本体为视角,我们更愿意将经学视为一个有着内在生命的、相对独立的、“自足”的学术系统。因此,对于近代以来经学蜕变过程的研究,除了像传统的做法那样必须对社会存在制约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外,本章将更加强调对清代经学内部发展理路的梳理以及对清代经学兴衰与中国近代学风演变的相关度的研究。

经学的“蜕变”,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从经学本身衰落意义上所说的蜕变;二是指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蜕变;三是指今文经学内部的蜕变。经学的蜕变,和清代的衰亡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致的。三种意义上的经学蜕变,既可看作经学蜕变的三层次,又可视作经学蜕变的三行程。

经学蜕变的第一行程早在古文经学独盛的乾嘉年间就已开始。整个

19 世纪,古文经学退入边缘,今文经学突入学术中心,但今文经学的复兴,也并不代表着经学重新获得了新生,这不过是经学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以前的回光返照。19 世纪以来,一直维持着“经退史长”的局面,20 世纪以来,经学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日益淡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思潮结流而来,经学不断后退,最终为哲学吞噬。在“五四”运动之民主与科学武器的批判下,经学全面崩溃,与文、史、哲彻底汇流,尽管有时还以“国学”的面孔重现,但已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经学了。国学是涵文、史、哲一家的人文学或文化学,仅以经学来诠释国学的学者已全然消失。

从学术发展源流看,清代中前期独盛一时的古文经学即汉学考据学有它的内在渊薮和理路的,其远因是晚期的东林遗风,其近因是清初的理学清算运动。惩晚明王学之“空”言心性,“师心自用”、甚至“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吸取明亡之“教训”,清代中前期学者转向弃“虚”蹈“实”的学术之路。古文经学的治学初衷,原亦不离“明道”之旨,不过是选择一条通过对儒学元典的字、辞、音、义、典制的确切含义的理解,以达到明了儒家元典的“义理”的治学门径。康熙以至乾隆时的承平日久,自然可以由着学者们就自己擅长而又感兴趣的考据学治学路径走下去。但当康乾盛世已成明日黄花,嘉庆、道光统治已经露出破败之象时,抛弃汉学考据学的偏枯、艰涩、少通贯、难发挥,有“考”而无“论”,有“事实”而无“义理”的学风,而转向“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学术转轨的时代来到了。经学蜕变的第一行程——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蜕变就开始了。今文经学与史学结缘,共同承担“处士横议”的新功用。到了中国近代,学术便主要地向两个方向——史学和今文经学发展。史学和今文经学成为近代学者社会选择的两个主要治学取向。“经退史长”的时代由此开始。龚定庵《古史钩沉论》、《尊史》已将史学提升到了“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①这种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魏源则表彰清初“史

① 《六经证明问答一》,《龚自珍全集》,第 39 页。

学”，直斥考据学为“无用之学”。^① 曾国藩“几乎舍经而言史矣”。^② 下至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退史长的趋向益发明显。甲午以后，以学术服务于政治之风益盛，史学的地位也在随着汉学的衰落而不断加强。到了康有为，痛诋古文经学已臻极致。

今文经学在清代的死灰复燃，时在乾隆年间。我们认为乾隆年间潜滋暗长的汉宋兼采思想伏流，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苏创造了一个学术氛围；今文经学家的资治即学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治学目的论是今文经学复苏的内因。清代早期的今文经学，以庄存与为开山，而以刘逢禄、宋翔凤为后劲。近代以降的今文经学家以魏源、康有为为代表。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家主“汉学”，有一个由主“东汉”向主“西汉”，即由主古文经学也就是考据学向主西汉今文经学的推移过程。早期今文经学家所主之宋学，系主程朱而非陆王。下至近代今文经学家魏源、康有为，则主陆王而非程朱。今文经学家尽管主汉宋兼采，但魏源、康有为则纯采西汉与陆王，以大胆附会而收“维新”、“变法”之效。今文经学家治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是“春秋重义不重事”，到了康有为，则异变为“春秋在义不在事”，以为孔子“托古改制”理论张目。今文经学“疑古”思潮，在中国政治现代化、学术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过中坚作用，尤其是康有为的激进疑古主义对政界、学界的冲击力度巨大，时称思想界之“火山爆发”、学术界之“飓风”。但“疑古”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即由反对疑古而渐次发展到疑古，最终彻底疑古大爆发。正是康有为，他从“尊孔”的原点出发，但最后的结果，却走向了尊孔的反面，走向了“损孔”和“贱孔”，从而揭开了五四以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疑古思潮大涌动的序幕。

怎样看待中国近代今文经学影响下的资治学风？它的巨大历史意义当然是面对“千年变局”进行的“救亡图存”行动在学术上的有力反应。

① 《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58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588 页。

但它的负面意义却是学术全然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奴婢。从魏源到康有为,今文经学派无不如此。这种影响一直延至“文革”时期,不仅没有得以及时遏制,且在民族独立的和平时空前泛滥。看来全面反省、深刻清理中国近代的资治学风实在必要。如何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社会、学术与现实、学术与经世的关系,仍是摆在中国学人面前一道亟需求解的难题。

纵观清代以来的经学蜕变史,我们认为,其第一行程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此前为古文经学即考据学独盛,此后为古文经学趋衰,今文经学与史学逐步抬头。第二行程始于19世纪40年代初,即鸦片战争爆发,此后今文经学主导学风学界,史学也日益自主化。第三行程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后经学地位动摇,史学完成自主化,西方哲学结流而来,经学逐步汇入哲学洪流中。第三行程至五四运动后期基本休止,经学防线在以科学与民主为主潮的五四大潮中全面崩塌,经学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

二、开眼看世界

在鸦片战争前后整个社会的急剧动荡中,经学经历了衰变,史学也开始一系列新的转向。西方力量对中国的冲击,西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得不睁开眼睛,凝望世界。头一回看到大洋彼岸的世界新貌,迥然不同于中国,史学首先觉醒了,《海国图志》问世了,中国开始被置放于全球大坐标中,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世界理念,史学的现代性开始萌发。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规模开放(给予英、法、美、俄等国在中国内地通商、游历、传教的权力,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和洋务运动的推进,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西学高潮,其中史学发挥了中坚作用,成了一道通向现实世界的文化桥梁,由此,我们有了第二章《通向世界的文化桥梁》。

本章依时间与逻辑的顺序,分为三节,即《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寻求救国真理——史家视野中的西政和西学》、《东西文化交融

中的现代中国史学》。

社会剧变,史学转向,其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由汉学考据转向了强调经世致用;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一变博古稽古之风,转向重大社会现实课题,特别是有关西北史地、当代史和世界史地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世界史地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史学分支的崛起,由于更为敏捷地反映了中国从传统闭关状态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趋势,不但在引导国人认识世界,介绍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以及促进整个社会现代意识的形成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还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命,故尤具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

中国近代的外国史地研究之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强烈地震动了朝野,同时也激起了一些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甚至少数上层统治集团的人经此事变,也感到再不能安坐井中,无视天下之大了。他们急切地开始探索世界大势,企图从中求得“制夷”之策。林则徐编译《四洲志》、姚莹编辑《康輶纪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梁廷枏编著《海国四说》、徐继畲编撰《瀛环志略》、何秋涛著有《朔方备乘》都是70年代以前撰成的世界史地名著。70~90年代,直至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殖民侵略愈深,中国的现代化思潮风气愈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展愈速,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愈迫,中国史学视野就愈宽,由西史而进探西政西学。此时,有关西方文明史、政治史、革命史、宪政史、财政史、教育史、商业史、伦理学史等译著与撰述络绎不绝。著名的有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泰力山《中国灭亡论》、邹容《革命军》等。此时的中国史著往往兼涉中外,以世界视野综论古今中外,在救亡图存、改变历史思想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

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西方侵略有增无已,史学的世界视野已由好奇、欣赏、羡慕走向探寻西方富强之“学理”,为迫在眉睫的瓜分大祸寻找解救办法。经过史学的引介和推重,“商战救国”思想,“维新救国”思想,“革命救国”思想相继深入知识层,对社会

发挥巨大的导向作用。当然,这时的外国史地研究有粗浅浮泛、急功近利之弊。但如果没有这道通往现实世界的文化桥梁,那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恐怕瓜分大祸真难避免。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入,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由视野变化转向全面变化之势。西方史学之传入中国,最初主要通过国内学者的外国史地研究和译介。如魏源《海国图志》因采用按类汇辑资料的方法,使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地著作基本保持了原貌,从而给国内一般人了解西方史著的叙事方法和体例提供了实例。梁廷枏在参考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编写《合省国说》时不自觉地受到了西史体例的影响。中国近代外国史研究者中较早注意到西方史学特点并有所取法的是王韬。他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自觉地采用了“广志”与“广述”以变通中国史书体例,容纳更多的社会内容。黄遵宪《日本国志》大量使用了数字统计等新式史表。与此同时,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编译的书刊对西史体例也有零星介绍,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引入了一些西方现代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如进化论、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法。至19世纪末,这些零星传入的西学史学观念引起了一些进步学者的注意。如康有为糅合中西学说,构建起以“公羊三世说”为外壳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体系。尽管19世纪末之前,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速率很慢,内容亦零星而不系统,可以说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但已在逐步动摇传统史学的某些观念或体制,并酝酿着新史学的产生。

三、西方历史哲学的输入

国内史学界之自觉输入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约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起,在“新史学”思潮逐浪兴起之际,西方现代历史哲学以及史学专业理论、方法开始系统输入国内,历史哲学有了革命性变化;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了新史学建设中首选的两大视野。历史哲学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由是我们有了第三章《历史